

神话的除魅

资源经济嵌入民族杂居区的
人类学研究

杨洪远 ©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神话的除魅：资源经济嵌入 民族杂居区的人类学研究

杨洪远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话的除魅：资源经济嵌入民族杂居区的人类学研究/杨洪远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 - 7 - 5095 - 8676 - 1

I. ①神… II. ①杨… III. ①民族杂居区 - 社会人类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C91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3246 号

责任编辑：王芝文

责任校对：张 凡

封面设计：陈宇琰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010 - 88191537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3 印张 215 000 字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8676 - 1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热线：010 - 88191661 QQ: 2242791300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由	(1)
第二节 相关研究述评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相关概念界定	(25)
第四节 区域选择与研究过程	(27)
第一章 我的田野地点——准格尔召镇	(31)
第一节 地在农耕与游牧叠合之间	(31)
第二节 准格尔召镇具体情况概览	(34)
第三节 煤炭资源经济主导下的产业结构	(38)
第二章 资源开发嵌入下的社会分层变迁	(49)
第一节 “本地人”——鄂尔多斯蒙汉杂居 的形成过程	(49)
第二节 “外地人”——煤炭高额收益吸引 来的异乡人	(59)
第三节 社会变迁的新财富阶层：“煤老板”	(66)
第四节 深度研究：对鄂尔多斯市当地“另 类农民”的人类学深描	(71)
第三章 资源开发嵌入下的生计方式的变迁	(81)
第一节 资源开发收益前的主要生计方式	(81)
第二节 资源大规模开发后的主要生计模式	(92)
第三节 个案研究：“鄂尔多斯模式”的除 魅	(103)

第四章 资源开发嵌入下的生活方式变迁	(113)
第一节 蒙汉族群杂居百年来的生活方式的交融	(113)
第二节 资源开发收益与消费文化的变迁	(126)
第三节 个案研究：危险的“愉悦”——“安纳咖”吸食	(139)
第五章 资源开发嵌入下的公民权利意识的萌发	(149)
第一节 权利意识萌发的“伊盟人”	(149)
第二节 女性主义的萌发	(161)
第三节 个案研究：一桩利益纠葛的婚姻引发的人类学思考	(170)
结语	(178)
参考文献	(187)
后记	(202)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及其前身伊克昭盟^①是内蒙古西部的一个很普通的地级市，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且交通十分不便，在传统的以平面垦殖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兼做粗放型的游牧生产方式的主导下，鄂尔多斯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社会停滞状态。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随着煤炭资源价格在市场上逐步放开，鄂尔多斯市以令所有人咋舌的速度向前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以高于20%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在2009年全市经济总量跃过2000亿元人民币大关，地区GDP实现2161亿元，是2000年150亿元的十多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34361元，^②超过当年的香港，成为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对于鄂尔多斯市的超常规经济增长，学术界对此给予高度

① 1644年清政府设置伊克昭盟东胜厅，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盟建市，将伊克昭盟改名为鄂尔多斯市。

② 鄂尔多斯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鄂尔多斯调查队：《鄂尔多斯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3月5日。

关注，并冠以这种以矿产资源经济为主要依恃的经济发展模式为“鄂尔多斯模式”^①。但是学术界的这种关注大多从国家主义或者是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出发，这些研究当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果仅从这一视角出发，却会有意无意地忽略“鄂尔多斯模式”的历史创造主体，即鄂尔多斯地区当地最普通的农牧民。这就无法讲清在一个充斥着传统主义的地方社会，怎么能够在短时间里创造出一个发展奇迹，并且能归纳出一种“模式”，为与之相似的贫穷落后地区作出示范。

自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开始关注国家社会，与社会学的方法论有所不同。社会学一般从精英的角度出发，自上而下来理解和解读社会，而人类学学者则习惯将自己原本的文化身份隐藏到当地的社会下层大众，去接触了解农民、少数族群、社会边缘人以及与之类似的人，希望从他们的眼光中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本书选这个题目的第一个缘由就是承继这个传统，通过对具体田野点的详尽研究，试图全面了解“鄂尔多斯模式”的历史创造主体，即鄂尔多斯市最普通、最朴素，也是最默默无语的当地农牧民。

再者，鄂尔多斯市不仅是一个矿产资源的富集地区，还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边疆地区，它的自然环境、历史与民间文化都与内地汉族聚居区有着明显的分野，即美国著名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谓的“边疆风格”（the frontier style）。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美国社会学者赫克特（Michael Hechter）曾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扩散模式（Diffusion Model）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Internal colonialism Model）。^②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是积极的扩散模式，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中央政府和经济速度发展较快、经济水平质量较高的内地汉族地区积极支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并在这个过程中，将中央政府

① 关于“鄂尔多斯模式”的相关研究，请参阅沈斌华：《论“鄂尔多斯模式”》，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额尔敦扎布：《西部开发的一种模式——鄂尔多斯模式》，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额尔敦扎布：《民生为本，惠及百姓——再论鄂尔多斯模式》，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内蒙古党委宣传部课题组：《西部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典范——“鄂尔多斯模式”解析》，载于《实践》2008年第9期；李含琳：《中国西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范例——内蒙古“鄂尔多斯模式”解读》，载于《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第2期；周耀亭、张晶：《透视“鄂尔多斯发展模式”》，载于《北方经济》2009年第4期；潘照东：《实现转型发展，创新“鄂尔多斯模式”》，载于《北方经济》2011年第8期等。

② 参见赫克特：《内部殖民主义》，载于马戎主编的《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9—90页。

及经济先进地区的行政制度、经济管理制度、教育及卫生医疗制度扩散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大提高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但也不可否认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在我国也是由来已久,很大一部分人在偏执而固定不变的历史发展五阶段论^①的思想桎梏下自觉不自觉地将国内各个民族用一个由低到高的阶梯序列中排列,刻板地以先进与落后来区分,用一种带有歧视的偏见来看待边疆各个族群,错误地认为国家对边疆的大力支持是生产力先进族群对生产力落后族群的“怜悯”。针对于此,以王明珂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近些年来开始强调重视“边缘话语”,即“所谓边缘观点或边缘研究,不一定是将边缘视为核心,而是努力发掘被忽略的边缘声音及其意义,及造成其边缘地位的历史过程,并因此让研究者对自身的典范观点(学术的和文化的)产生反思性理解”^②。本书也是以“边缘话语”为研究主旨,即对鄂尔多斯市当地人对资源开发嵌入的社会变迁的自我建构的再建构,以此来探究随着资源开发大规模深入边疆各个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内部结群以及文化表征的整体社会变迁,为更好地建立和谐的边疆民族关系做出学人应有的贡献。

本书选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大大改变了鄂尔多斯市,的确推动了当地的迅速发展,政府收入显著增加,城市人居建设与三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但是也遗留下了许多发展不良的副产品,即自然生态失调和人文生态失范。类似鄂尔多斯市的资源富集区和民族杂居区在中国西部还有不少,我们可以预见,资源经济的发展也会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要有效借鉴鄂尔多斯市的成功经验,尽量避免鄂尔多斯市的发展之殇,首先必须要全面熟悉鄂尔多斯市这三十多年的资源开发嵌入下的当地人的社会变迁。为达到这个目标,现代人类学研究所秉持的整体论和田野调查是一种非常可行的视野和方法论。

综上所述,本书试图通过社会变迁的历史维度,以个案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将鄂尔多斯当地最普通的居民视为人类学研究释义下的“他者”,去探究资源开发是如何嵌入他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群体内部结构和文化表征中的,并且期望以这种“他者”的眼光来审视我们自身并审视中国中西部的原本贫穷落后的资源富集区,以求达到人类学视野下所期望的真正意义上的理性。

① 历史发展五阶段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② 王明珂著:《羌在汉藏之间》,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自序第3页。

第二节 相关研究述评

一、社会变迁经典理论研究综述

“理解变迁过程，是人类学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目标之一。”^①事实上人类对社会变迁的关注要远远早于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诞生，而人类学的发展壮大乃至在全球开花结果，一方面归功于人类学独特的工作方法，即田野调查研究，但另一方面，人类学之所以去做田野却是因为背后有一整套的社会理论在支撑。毫不讳言，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研究，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不可能绕过西方经典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的学术思想。如果不了解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脉络，那田野工作就很难达到预期，研究者本人也不应该称自己从事的是人类学的专业研究。

由于学术立场基于不同的哲学理论脉络，同一个问题在学术界自然会有不同的认知，社会变迁的理论研究也是如此。面对多种的社会变迁理论，有些学者曾给以归类，例如摩尔（Moore）的四分法^②、波普诺（David Popenoe）的四分法^③、瓦戈（Steven Vago）的四分法^④、斯梅尔瑟（N. J. Smelser）的六分法^⑤等，本书主要以瓦戈的四分法为基础，简要评述西方经典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的社会变迁理论。

1. 进化论

19世纪中期以后，在人类历史发展理论解释的演进中，进化论无疑占据着主要地位。被公认为西方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Auguste Comte）将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和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两部分，其

① [美]威廉·W. 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2页。

② 摩尔的四分法社会变迁理论：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变迁理论、功能学派和冲突理论。

③ 波普诺的四分法社会变迁理论：进化论、循环论、功能论和冲突论。

④ 瓦戈的四分法社会变迁理论：进化论、冲突论、结构功能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

⑤ 斯梅尔瑟的六分法社会变迁理论：古典进化论、文化堕距理论、古典文化交流理论、古典功能学派、多方向进化论和兴起于衰落理论。

中社会动力学就是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的分支。孔德还将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这就是一个按照社会演进不断发展的进化论。另外不为世人所知的是,孔德(1798—1857年)提出社会进化论的时间要早于著名的生物学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1809—1882年),是他们共同在19世纪的生物学和社会学领域将进化论定义为自然法则,即每一个阶段的社会发展要优于前一个阶段,以此而得出,人类的终极阶段将趋于完美。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对社会变迁研究的学者们。在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的人类学领域,美国的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是最有代表性的,他的名著《古代社会》阐述了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历程,并指出人类社会最终必将进入没有私有财产的乌托邦境界的前景。^① 摩尔根关于进化论的思想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使用了大量摩尔根关于北美印第安部落的观察案例。摩尔根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②,苏联的民族学研究的源头就是来自摩尔根的进化论,这也直接影响到了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的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政策制定。

进化论的另一位学术巨擘是英国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把进化看作一种简单的直线发展,认为进化是一种持续的、稳定的、逐渐积累的过程,而人类社会的变迁也必然会按照自然界的进化过程向前发展,人类社会也如同自然界一样“自然选择,优胜劣汰”。斯宾塞的进化论后来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尤为深刻。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屡战屡败、西方屡战屡胜的残酷现实使中国人非常自然地接受了“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强化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大大地推动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向西走”和激进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进化论的思想意义更多地在于它展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疏离于沉沦的现实并走向未来的道路”^③。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学者也采取了进化论的思想来解释社会变迁,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② [美]史蒂文·瓦戈著,王晓黎等译:《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2页。

③ 王东杰:《“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1895—1905)》,载于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页。

例如德国的滕尼斯 (Ferdinand Toennies) 的社会变迁理论就是“从礼俗社区到法理社会”^①，人类学著名学者雷斯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 的名著《俗民社会》也将社会变迁过程视作为从俗民 (folk) 到城市的过程^②。总之，以进化论为主要思想指导的经典学者们无论从何种角度去解释社会变迁，都将社会变迁视为“自然而然、定向的、即将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必需的，而且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连续不断地进行”^③。

随着 20 世纪科学民族志的兴起，对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各类型的“异文化”了解的不断加深，单线条的进化论在实证的研究下逐渐失去理论说服力，尤其在文化相对主义成为主要思想指导的人类学研究领域，强调单一演进的进化论被首先抛弃。但是不可否认，进化论对社会变迁的解释至今仍以各种类型方式存在着，例如在经济学领域，进化论的思想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例如它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仍然是强有力的。这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中国，必然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他学科。

2. 冲突论

无论对社会变迁理论做何种分类，冲突论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认为社会是一个为争夺稀缺资源而产生的战场，其中社会内部结构的矛盾被认为是冲突的根源，社会变迁只有通过冲突才能发生。关于冲突论，有三位思想家是不可不说的，那就是：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刘易斯·科塞 (Lewis A. Coser) 和拉尔夫·达仁道夫 (Ralf Dahrendorf)。

马克思认为社会研究的基础不在于玄而又玄的神学讨论，而是 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下工人阶级所处残酷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对那些试图掩盖现实的伪善的社会理论，马克思毕生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揭露现实中正发生的一切，解释经济基础的残酷无情的运作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欺骗”^④。在对社会变迁的解释上，“马克思不是只希望着社会冲突不再存在，而

① [德] 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和社会：纯粹社会学基本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43 页。

② Redfield, Robert. "The Folk Socie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1947, pp. 293-308.

③ [美] 史蒂文·瓦戈著，王晓黎等译：《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45 页。

④ [美] 兰德尔·柯林斯、[美] 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46 页。

是努力去把握社会冲突的现实,在这方面,他是第一人”^①。

马克思主张,无论任何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都要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②。包括对社会变迁的解释,马克思也认为,“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解释”^③。对马克思来说,生产方式是解释社会变迁的决定性概念,它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组成,生产力的变迁促成了生产关系的变迁,即变迁是生产中的群体的社会关系依附于生产技术的方式来进行。由于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生产力摆脱了历史长时间的停滞状态,逐步提高,那么马克思认为,冲突就必然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正常状态,因为经济生产中的变革会直接带动与其相关的价值、观念及社会规范的变动与变迁。所以马克思直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的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反映。”^④对此,马克思的坚定支持者恩格斯也给予更详尽意义上的阐释:“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的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反映。”^⑤

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美国的种族矛盾、阶层矛盾和社会各方利益争夺的白热化,社会变迁的冲突论在实践基础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在理论层面上也得到了升华,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刘易斯·科塞所著的《社会冲突的作用》。

科塞认为,冲突是社会化进程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完全平衡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积极的社会冲突有助于协调团体内部统一体的建立,加强团体内部的联合和内聚力,消极的冲突则会摧毁社会的现存结构。当然冲突

① [美] 兰德尔·柯林斯、[美] 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9页。

⑤ 同上书,第741页。

在不同的社会结构表现的作用不一样，在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里，冲突“具有稳定和整合的功能……这样的社会系统能够通过消除不满的原因重新调整他们的社会结构……为自己找到一个重要的稳定机制”^①。但是冲突具有稳定和整合社会结构的功能在一个僵化的社会却很难达到，“后者因为压制冲突，从而也消除了一个有用的警报，因此把灾难增大到极限”^②。所以科塞把冲突视为一种促进社会变迁的手段，通过多种途径，冲突能够不断在社会结构当中刺激那些与社会变迁有关的创造性力量。科塞的冲突论思想对现代美国社会学界影响极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建构了美国政府的“寻找假想敌”的军事和外交政策。

另一位对社会科学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冲突论思想家是拉尔夫·达仁道夫，他不认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阶级决定于生产方式的观点，“理论应该解释的各种事件违背它的要求，由它所预言的发展并未在任何地方出现过”^③。他认为社会权力分配不平衡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各利益集团各司其事，这样虽时常会有一些小冲突，但却限制了严重冲突的集中爆发”^④。所以他对现代社会冲突的定义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⑤。

由于达仁道夫视冲突为社会内部权力分配不平衡所致，所以他认为解决外部冲突是缓解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而马克思则认为冲突是社会内部运转的主要来源，“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⑥。因此达仁道夫主张，现代社会的许多冲突不能用马克思的革命手段去解决，最可行的办法是通过社会集团之间的妥协来控制冲突，维持社会正常运转。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科塞和达仁道夫虽然持比较激进的社会观点，但本质上还是一种维护型的社会变迁理论，与马克思的冲突论的目标和指向大相径

① [美] 科塞著，孙立平等译：《社会冲突的功能》，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② 同上。

③ [英]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林荣远译：《现代社会冲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④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页。

⑤ [英]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林荣远译：《现代社会冲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庭，他们的目的是主张更多的社会变革来巩固和维护社会制度，首先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非颠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期处于各类社会思想的指导思想理论范畴，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论深入人心，而科塞和达仁道夫的维护型冲突论在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则相对匮乏。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多种类型经济成分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的利益关系格局发生剧变，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族群矛盾、地区矛盾越来越大，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各类利益集团共存，社会结构多样化的社会。如何整合这个多样化的社会？科塞和达仁道夫的维护型社会冲突论肯定会有所作为。

3. 结构—功能理论

随着19世纪生物科学发展的突飞猛进，生物学的很多概念被直接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当中，“结构”与“功能”是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概念之一。所谓“结构”指的是“一组社会单元相对稳定和形成的关系”；而“功能”则是指“任一社会活动的影响，这些活动有助于改建或调整一个假定结构或其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结构”是指具有相对持久方式的一个系统，而“功能”则是指结构中动态的过程。^①

结构—功能主义的第一个大师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他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动荡、暴力和堕落”^②。他的著作《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自杀论》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研究目的都基于此。在对社会变迁的解释中，涂尔干不认可马克思认为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劳动分工是内在的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这种类型的社会必然走向灭亡。他的名著《社会分工论》提出了一个著名概念“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认为社会结构就如同生物体的各个器官，劳动分工的功能使社会结构的各部分互相交换，正常运转，社会变迁的最终走向是社会融合。在涂尔干看来，功能是对社会中社会生活能够正常运转的一种贡献，他对社会仪式、宗教生活的意义的讨论，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对现代西方社会变迁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非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莫属。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各个功能互相支持的系统，社会结构的动因存在于与它

① [美] 史蒂文·瓦戈著，王晓黎等译：《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1页。

② [美] 兰德尔·柯林斯、[美] 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0页。

相互关系的其他结构之中，它们之间进行着相互交换与相互支持。社会变迁的发生，一方面由系统内部的张力引起，如经济原因、科技原因等，另一方面由系统外部的其他系统引起，主要是“前一次变迁未完成的各个部分的整合”^①。帕森斯特别关注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他认为价值观的变化是变迁的首要动力，从长远来看，文化传统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英雄人物的作用，所谓英雄人物只是将文化传统的某些潜力激发而已。

真正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去指导社会变迁实践的是人类学家对西方以外的“异域”社区研究，最著名的是英国的两位人类学大师拉德克拉夫·布朗（A. R. Radcliffe Brown）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前者特别强调蝴蝶标本似的结构，可以说主要是在理论上给予结构功能主义以支撑。后者则主要侧重于方法论上，即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科学的民族志，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田野工作方法的探索还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可以说，目前的从事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很多学者都是承袭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衣钵；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本土化的人类学能够成为一个学派的话，那其本质也是“功能主义人类学”在中国特定环境下的再建构。

后来的著名人类学家，如白特生（Gregory Bateson）、埃文斯·普理查德（Eavns Pritchard）、格拉格曼（Max Gluckman）以及利奇（Edmund Leach）等人在反思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得失时，在20世纪后半期也大大推动了结构功能主义向前发展。我也认同结构功能主义对整个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是方法论的探究，即王铭铭所言“功能主义提供了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强有力的架构，使人类学者可以在同一个架构的范畴里对理论和概念进行评估并发展出新的理论和概念”^②。本书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的研究框架也是西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脉络的一个延续。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是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富集区与民族杂居区面临社会变革最为交织的地区，同样也是出现问题最多、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的地区。而强调“问题”意识是所有学术领域的关键特征，著名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Eavns Pritchard）曾说，“或者可以在同一个架构的范畴里对理论和概念进行评论并发展

① [美] 兰德尔·柯林斯、[美] 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4页。

② 王铭铭：《功能主义人类学重新评估》，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出新的理论和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告诉学历史的弟子要研究‘问题’而不要研究‘时期’；科林伍德（Collingwood）告诉学考古的弟子要研究‘问题’而不要研究‘遗址’；我则要告诉我的学人类学的学生要研究‘问题’而不要研究‘民族’”^①。对于理解这类问题，阐释改革后在中国发生的种种类型的社会变迁，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鄂尔多斯市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自然也不例外。

4. 社会心理学理论

心理学对社会变迁理论的影响在 20 世纪后期越来越大，与上述学派不同的是，这一学派的学者们认为社会变迁最根本上改变的是人而不是其他别的东西，具体说是人的思想的逐渐演进导致社会发生了与以往不一样的变化。社会心理学社会变迁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放在处于特殊背景下的个体身上，而不是聚焦于技术的变迁、环境的变化或者是社会结构条件的变革当中。开创社会心理学派研究的是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简单而又基本的问题——使资本主义文明有可能得以发展的心理条件”^②。

韦伯认为现在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可能是因为西欧 16 世纪宗教改革所致，或者更极端地说，现代西方文明是新教伦理的产物。“只有禁欲主义教派的条理化生活方式才能使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经济‘个人主义’动力成为理所当然，并且使它熠熠生辉。”^③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特征确切说是一种心理状态，处于这样心理状态下的人对劳动的态度与任何其他社会完全不一样，劳动不仅是获得快乐生活的基本手段，而且是生活的最终目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的个体必然视懒惰、安逸、浪费和无止境的享受生活为耻辱，而且在物质财富的努力追求中，人们不断通过理性来调整自我的生活方式，使之更有效率、更合理，“这些联合体（新教各派教会）所培养起来的那种‘精神’对整个生活的渗透，无疑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牢固生根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说，它使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一庞大群体中，

① [英] 埃文斯-普里查德著，冷风彩译：《论社会人类学》，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9 年版，第 61 页。

② [德] 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前言第 9 页。

③ [德] 同上书，第 384 页。

以及最后在被迫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大众中，开发出一种恰当的生活方式，从而获得了对生活的支配力量”^①。如果处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的个体沉溺于世俗的欢乐之中，挥霍财富，那么他就会“由于道德过失被革出教派，这就意味着经济上丧失信誉，而且在社会上将难以立足”^②。自此韦伯得出一个结论，新教伦理归根到底是一种心理上的虔诚，是自我的约束和对财富享乐生活的谨慎，并由此成为作为个体对工作的献身和对未来后世对回报的延缓，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先决条件。

虽然对于新教伦理是否与资本主义发展存有直接的关系，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但是运用宗教或者伦理等形容人类社会“主观”概念的词来阐释社会变迁却在学术界成为一种运用较多的方法论，如后来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阐释儒家价值观对东亚社会经济的功能研究以及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对日本宗教在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的研究都属于这一范畴。

人类学借用心理学的理论成果来研究社会变迁现象则要追溯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可以说正是弗洛伊德对人类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启发了一代著名的人类学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的文化人格学派的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米德（Margaret Mead）以及林顿（Ralph Linton）等。他们大致认为，文化塑造了各个民族不同的“基本人格”，在经历社会的剧烈变迁过程中，这种“基本人格”又决定了各个民族不同的命运，如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的名著《菊与刀》中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一个部落的正式习俗也许百分之九十与邻近部落相同，却可以作些修改以适应与周围任何民族都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会排斥某些基本习俗，不论其对整体的比率是多么小，都可能使该民族的未来向独特的方向发展。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最有益的。”^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因素的驱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个不同类型的非西方式社会都处在强势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

① [德] 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页。

② 同上书，第369页。

③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页。